

中

德

本书所收论文涉及 19 世纪末期德国势力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发生的重大影响。诸如德国租借胶州湾及其在山东势力范围的形成,在华德国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中国民主革命家在德国的活动,德国与中国国民党,德国与中国的铁路,尼采哲学,德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质地理调查等事。在中德关系史研究领域,还没有一本像本书这样,集中这么多一流学者,从近代以来中德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系统梳理中德关系的。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所收论文涉及 19 世纪末期德国势力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发生的重大影响。诸如德国租借胶州湾及其在山东势力范围的形成,在华德国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中国民主革命家在德国的活动,德国与中国国民党,德国与中国的铁路,尼

中德关系史 研究论集

张寄谦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德关系史 研究论集

张寄谦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张寄谦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1-16633-8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德国-文集
IV. ①D829.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3328 号

书 名: 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

著作责任者: 张寄谦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方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633-8/K·07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9.75 印张 39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在当今世界,中国和德国已经成为具有无可争辩影响力的大国。中国自 1978 年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德国统一后,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欧盟中与法国并驾齐驱,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德国一直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期最终成为能在国际格局中更有发言权的力量。

1972 年 10 月,联邦德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后的 30 多年里,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自 1993 年 9 月德国政府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以来,两国的关系更是全方位地向前发展。

然而,在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方面,虽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中国有所加强,但与中外关系研究中的中美、中日、中英关系研究相比,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前几者多。因此,在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上还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随着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加大,这样的研究就更显得意义非凡。

这本《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实际上是二十多年前中德两国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当时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变化,西方学者对中西方关系史的研究逐步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德两国学者都对开启在中德关系史上的研究合作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这本文集最终能够以翔实的内容完整地再现了那样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

我们通常说,具有不同世界观的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自然总会

选择不同的原始材料,把重点放在不同的因素上,从而最终得出不同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学者受到所处社会的影响,同样的主题和时期被掌握着同样原始材料的不同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描述和解释。歌德曾写道:“必须不时地重写历史。……这么做的必要性不是由于发现了许多东西所致,而是由于后来某个时代的某个人采纳的观点而形成了新的看法,站在这些观点的高度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审视和评价过去。”^①

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强调要客观、公正,然而我们也知道做到这一点对于史学家来说是困难的,也是他们必须不断付出艰辛努力的主要原因。曾有西方史学家强调:“我们的滑铁卢必须是使法国人与英国人、德国人与荷兰人都同样满意的滑铁卢。”^②以往国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或论文多为单方面所完成,而国外研究中外关系的工作又多由另一方主导,这就难免使这样的研究结果有片面之虞。而这本《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则是国内少有的一部由中德两国学者共同完成的著作。由于完成于两德统一之前,《论集》的作者既包括了中国的学者,也同时有来自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方面的学者。历史学者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受所处历史条件与社会进程的影响,而通过研读这些来自不同背景学者的研究成果,读者会比较容易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中德关系史的内容。

对于这本《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

首先,这是一本来自中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三个方面学者的高水平的论文集。

二战之后,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德国的分裂也一步步成为现实。新中国由于实行了“一边倒”的对外关系政策,在此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只能与其中的一个德国发

^① Helge Krag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1987, p. 235.

^②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70, p. 54.

展外交关系,这无疑对开展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然而,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她与德国学界的渊源关系还是很深的。就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知名教授都是在德国接受的教育,或曾在德国专攻某一学术领域,如季羨林、洪谦、郑昕、贺麟、熊伟、冯至先生等。北大西语系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也一直在国内德国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应该强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是国内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生的重点单位之一。即使是在东西方冷战时期,我们系一直有着来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派遣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我自 1952 年院系调整后由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学秘书,当时的一项工作就是兼管系内的留学生工作,包括给留学生授课。这些留学生中就有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生,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从中学直接选派来中国的,一个个天真可爱,和我们教员的感情非常深。他们大部分后来都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这些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中国问题的东德学者,到 1980 年代,他们在中德关系研究上的造诣明显超过他们在西德的同行,不仅是人数上,他们的论文质量也比对方高很多,这是与东德长期与中国保持着联系分不开的。如二战后在东德继续兴办的洪堡大学是一所 1810 年建校,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知名大学(北大与洪堡大学自 1950 年代至 1967 年一直有学者交流,后中断 15 年,到 1982 年始又恢复);而后来与北大建立校际联系的西柏林自由大学是 1948 年才建校的,二者在学术地位上的可比性很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柏林自由大学也就算是西德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了。可以说,北大历史系与东西两德学界的关系为这本书的出版打下了基础。

其次,这是一本东西方关系缓和后,西德、东德学者与中国学者开展学术合作后共同完成的论文集。

冷战中东西方出现缓和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西德采取的新东方

政策,即西德与位于其东方的,包括东德在内的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1969年10月,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以勃兰特为总理的联邦政府。这届政府开始突破原有的政策禁区,即开始承认东德,承认以奥得—尼斯河边界为主要标志的二战后的边界现状。并且,勃兰特任内,联邦德国也于1972年10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柏林墙两端发生了变化,西柏林也在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柏林自由大学是1948年在美国的倡导下,在柏林的美国占领区中办起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西德与中国建交不久,该校就向北京大学派出了留学生,其中有两位到北大历史系的女学生都起了美丽的中文名字,一位叫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另一位叫柯兰君(Bettina Gransow)。作为她们当时的教员之一,我的印象里罗梅君很开朗,喜欢研究学术、社会问题;而柯兰君稍沉默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留学,大概是罗梅君和柯兰君对北大历史系的学术水平反映还不错,1980年代初,柏林自由大学派该校华裔教授郭恒钰(Kuo Heng-yü)来北大历史系访问。郭教授访问北大历史系后不久,西柏林自由大学校长正式向北大校长提议,双方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在1981年4月6日双方达成协议:西柏林自由大学的东方学系汉语专业(der Fachrichtung Sinologie des Ostasiasatischen Seminars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建立学术合作关系,共同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德关系。并且议定该项目西柏林自由大学方面主持人是郭恒钰教授,北京大学方面是张寄谦教授,双方各自开始约稿启动合作项目。

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外事处长哈特维希(Dr. Horst Hartwich)对该校与北大建立校际交流很高兴,拨出专款邀请北大经济系陈振汉教授夫妇和我赴西柏林作一个月的访问,在此行中我也跨越了柏林墙访问了东柏林,见到了我在东德的学生们。哈特维希发现我在各种场合都能流畅地运用英语开展交流,十分高兴,特意送了一部伦敦泰晤士出版社

当年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给我,并在扉页上亲笔题词:“张寄谦女教授为了增进与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友谊,于1982年对我们进行了访问。谨以此书作为我们友谊交往的纪念。”哈特维希签名的落款时间是1982年7月13日。感谢罗梅君女士专程从西柏林把这部沉甸甸的地图集送到北大中关村我的家里。

至此之后,柏林自由大学与北大的校际交流一直延续下来。1987年5月,时任校党委书记的王学珍和副校长陈佳洱等应西柏林自由大学邀请,赴联邦德国访问。1988年6月21日,北大与西柏林自由大学续签校际交流协议,柏林市市长迪普根、柏林市对外政治部主任布鲁赫、自由大学校长海克曼、外事处长哈特维希、郭恒钰和王学珍、丁石孙等出席了签字仪式,两校关系更加密切了。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这个统一是以东德归并到西德的形式完成的。到今天,罗梅君、柯兰君不仅是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也已成为德国为数不多的汉学家。由于罗梅君在掌握汉语上占有优势,她比柯兰君在德国汉学界的知名度更高。而二十多年前,是由于西柏林自由大学的积极推动,加之中国已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我们才开始了这本《论集》的合作。

再次,也是这本《论集》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以往国内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德关系的著作那样集中在较窄的领域,而是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由中德两国学者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广泛和深入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中德关系的机会。

在北大历史系开始着手这个研究文集的项目后,大家都很高兴,许多国内学者纷纷响应我的约稿,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的资深教授和外交学院的德语教授都不辞辛劳地帮助我们翻译来自两个德国的论文。有的论文翻译后原作者(德国方面的部分作者具有阅读中文的能力)不满意,提出重译,这些德语教员也毫无怨言。

《论集》对中德关系史研究的起始点选择了19世纪。德意志民族

的形成是一个数百年的长期过程,中世纪内部的分离力量阻碍了德国发展成一个民族国家,所以人们都说德国是一个晚熟的国家,或说“晚成的民族”。而中国从国家的层面上与德国开始交往,基本上自19世纪起。“普鲁士在19世纪的前半期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哈布斯堡帝国。”^①所以,在欧美列强中,德国也是最晚到中国的,是在俾斯麦完成小德意志意义上的统一后。

《论集》开始的几篇论文就集中于德国作为列强之一进入中国后的中德关系。第一篇是刘善章撰写的《19世纪末德国租借胶澳及其在山东势力范围的形成》,刘先生是北大历史系1970年代初与海军政治部合作编写《中国人民海疆史》一书时,我们在山东青岛认识的同志。

第二篇是我写的《义和团时期的中德关系》。我很欣赏德国人的朴实作风,认为中德两民族在文化意识上有着可以互通的共同点。这是一篇意图全方位地分析中德关系的文章,不像文集中其他学者仅就中德关系的某一方面分析问题。德国的议会制度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清政府派往德国的公使,如许景澄、吕海寰等都十分推崇德国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以及中德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清政府也一直坚信“中德交好多年,从未以干戈从事”,希望中德之间“邦交永固”。中国人对于自19世纪80—90年代以后德国在华势力和影响步步加深,远远不像对德国在欧洲的老对手英国那样敏感和忧虑。直到德国强占我国胶州湾以后,清政府对中德邦交仍深信不疑,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在胶州湾事件后,尚面召新任驻德公使吕海寰,亲口对他说:“倘异日他国与中国无端寻衅,或有侵损中国利益事,德国必能出为帮助。”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强者为了使弱者甘心被宰割而做出的虚伪承诺,弥补不了侵略的事实,随着德国强租胶州湾,中德关系就发

①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在这篇论文中较多地引用了德文《德国外交文件》(Die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1871-1914),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与首相毕鲁往来的文件;利用了美国翻印的英国议会文件(俗称蓝皮书),美国称为《美国外交文件》第4号的1900年部分;还利用过法国的黄皮书;用过张蓉初教授校译的《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档案》;《瓦德西回忆录》卷三在华部分,柏林版;还有北京海关总署英籍职员辛普森(B. L. Simpson)所编的英文原文《京华片语来鸿》,此书是1900年驻华外国使馆被围困时最详尽生动的记录。中文史料方面我利用了故宫博物院编的《光绪庚子辛丑电报》义和团(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义和团时期),其中山东巡抚张汝梅函、山东按察使毓贤的禀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室的稿本。还有义和团时期驻德公使吕海寰的《庚子海外纪事》,吕海寰《杂钞奏稿》,徐抚辰档案,前任驻德公使许景澄的《许文肃公遗集》,荣禄的《荣文忠公集》,以及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奏稿》中的电报等等。

接下的一篇是西柏林自由大学东方学系汉语专业米琪(M. Micheal)先生的论文《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对华派遣远征军的原因》。在西柏林时我结识了米琪先生,在了解到他运用中文的困难后,帮他充实了文章的内容并润色了文字。

在涉及对中德关系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时,以往国内较多的研究都以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年)为第一人。而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研究起始点的问题,本书选择了李希霍芬。

书中收录的由刘心务先生撰写的《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质地理旅行考察》是一篇分量颇重的文章。今天的德国学术界只把李作为一个偶像,对他已经不再研究,至多是在他逝世多年后写些怀念文章而已。而刘心务先生的这篇论文对于李希霍芬的论述,其全面详尽程度恐怕难有文章企及;其内容丰富深刻,非有多年潜心研究不可能完成。

刘心务先生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4年的毕业生,我在

清华上学时就听过他讲授的世界地理课。刘心务在文中详尽地记录了李希霍芬不放弃机会参加社会实践,不断扩大知识领域,最终成为一位伟大学者的历程。李希霍芬在大学时代就立下志愿研究中亚地区。他是学地质的,但他兼学其他自然科学,把它们综合起来建立起今天被称之为地理学的学科。他参加普鲁士远征队,或称为外交商务使团,在伊奥伦堡伯爵(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即艾林波)的率领下于1860年离开德国前往东亚,准备去掠夺中国、日本等国,威胁它们签订条约。远征队的训令说:如果中国拒绝谈判,他们便可同正在中国作战的国家(指英法联军)联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到达中国的普鲁士军舰吃水较深不能驶进白河,所以远征队最终未能逼近北京。于是远征队经过香港、广州、上海,到日本谈判仍未达目的。1861年3月再到北京时,英法联军已经撤退,远征队(代表普鲁士政府)经过谈判于1861年9月与清政府订约,成为中德关系的基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李希霍芬于1867—1868年新旧交替的年月返回东亚到中国。1868年李希霍芬取得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前往中国旅行考察的资助,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即从1868年9月到1872年10月,他在中国做过七次不同路线的考察,清朝行政区划内地18省当中去过13省,只有贵州、云南、广西、甘肃、福建未去过。

李希霍芬作为普鲁士远征队的成员之一,他同那些19世纪或更早来中国的外国探险家一样,肩负有为自己国家开拓疆土和市场的使命。而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对地质地理科学也做出过重大贡献。李希霍芬认为,中国的黄土高原是风成沉积而成的。大量的尘土由风从亚洲内陆广大沙漠地区搬运过来,主要在那些风速小的低地和盆地沉积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堆积,最后甚至把下伏的地面完全覆盖。

李希霍芬“风成说”的理论得到了国际地质学界的赞同,大家认为欧洲莱茵河谷,美国密西西比河谷的黄土层也是风成的。我们说科学家都是在前人的成果上不断有所发明发现的。记得刘心务先生在把他

关于李希霍芬的论文给我后,立刻告诉了比他高年级的学长刘东生先生(1937年考取清华)。刘东生先生立刻让一位女教务员从我这里把刘心务先生的论文复印了一份。刘东生在他的研究中也受到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黄土高原是风成说的启发,长年到陕西、青海、内蒙等地作实地考察,先后获得多项科学奖励。他在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方面做出了多项开创性的研究,于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如果我们从汤若望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进入广东算起,1661年,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直至康熙五年(1666),汤若望病死于寓所。三年后,康熙给汤若望平反。作为普鲁士尚未崛起前的一个德国人,汤若望给中国带来了西洋历法,介绍了伽利略的望远镜技术、16世纪欧洲的采矿和冶炼技术、西洋火炮原理等先进知识。他在北京监督修建的宣武门内的南堂(北京城内第一座天主教堂)和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都成为他用西方文明影响中华文明最好的佐证。与汤若望相比,李希霍芬则是在近代通过对中国黄土高原的考察,对人类的地质地理科学做出贡献的第一人,我们不可否认李希霍芬的先驱作用,刘心务先生的文章对此做出了最好的研究。

书中关于一次大战前至二战前的中德政治、外交、军事关系也有着丰富的论述。民主德国的费路(Roland Felber)和胡伯坚(Rolf Hubner)提交了《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00—1924)和《中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在柏林》(1925—1933)两篇论文。郭恒钰教授提交了《从德国外交官的眼中看1927年的德国和中国》。还有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现代和当代史教授伯恩德·马丁(Bernd Martin)根据他们学校15位专家教授共同编纂的论文集《德国顾问在中国1927—1938,军事—经济—外交》一书压缩摘要而成的论文,在此书中名为《德国与国民党中国(1927—1941)》。

费路是我们的学生之一,他1950年代到北大历史系留学,到1960年

代,费路开始在洪堡大学主持当代中国研究,撰有《关于中国当代的“历史考察”问题》等著作,成为东德研究中国问题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也在当时东德的党内担负过很重要的工作。马丁教授所在的弗莱堡大学,全称为阿尔布莱希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弗莱堡市,建校于1457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以人文学科见长。弗莱堡大学在2007年被评为德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其研究水平是非常高的。

马丁教授的论文共分六个部分,论述非常精彩。文中对一战后魏玛共和国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被称为“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在一战结束凡尔赛和约订立后,德国处于战后的混乱之中,通货膨胀,鲁尔区的被占领,包括凡尔赛条约决定归还其在山东的权益给中国,而由“二十一条”转交到日本,都使魏玛共和国忿忿不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魏玛共和国与当时的中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章第二部分是“从广州公社(1927)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1935):中国革命和动乱中的德国顾问”。这部分分别叙述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德国顾问。文章第三部分,“中立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分析了从承认南京政府到结束满洲危机这段时间的德国官方的对华政策。文章第四部分,“后起国家思想的共同性”,分析认为中国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对德国的特殊道路是赞同的。

为表示对中国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华的德国公使曾送给北京大学1000册图书。1921年德国支持以医科、工科为主的上海同济学院升格为同济大学。德国提供给同济的款项第一次为25万金马克,另一项由30家德国公司企业赠款65万金马克。1924年同济被国民政府批准改名为大学,1927年被正式接管为国立大学,1930年增设法学与社会学系。1937年日本占领上海,特意将同济大学摧毁,同济大学迁往后方。

德国不断从文化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当时在华的4000多德

国侨民,其中 1/4 的人是在中国的中学或其他教育机构任职。1930 年代德国著作译为中文的有:费希特(Fichte)的《对德国民族的演说》,黑格尔(Hegel)《关于世界哲学史的演讲》,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哲学家埃杜阿德·史普朗格(Eduard Sprunger)关于民族性格的著作。蒋介石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以德国为榜样。而在 19 世纪普鲁士的文化部长卡尔·海因利希·伯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就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与德国的关系,马丁在他们的文章里也有很清晰的论述。从德国方面来讲,中国成为德国武器出口的主要对象,德国又垄断了战略资源中国钨的出口,这自然是有巨大战略经济利益的。而对于中国来讲,从 19 世纪中后期起,清政府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就对德国的军事现代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把德国作为富国强兵的楷模之一。19 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工业水平在几个大国中还是最差的,从地缘政治上讲,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利,被强国东西包围,国内问题也很多。然而,它的教育制度是非常完备与出色的,从教区学校到大学在整个欧洲已经无与伦比,这为提高军队的兵源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行政体系的效率很高。它的军队有一个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并不断进行战术与战略的革新。所以,国民政府在一战后主动地寻求德国的军事援助是很自然的事情。

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最终起了变化,这是源于国社党的对华政策开始转向日本。马丁的论文对这部分也有较详细的论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认为日本是少数非雅利安族中的有文化的种族,仅次于雅利安人的有文化创造才能的种族,而把中国人排在和黑人同一个等级,是低等民族,他推崇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德国一些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政治人物,如狄尔克森伯爵(Herbert von Dirksen)、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和国社党内的外交政策专家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与工业界领袖人物蒂森(Thyssen)都支持希特勒的主张。当然,在德国内部也有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力量,如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Neurath)就肯定

地认为:承认满洲国一事,不能予以考虑。老一代德国精英的基本态度都是亲华的,但和平修正主义者终于失败。1938年2月,希特勒在国会演讲时宣布将承认伪满洲国。德国又于1941年7月1日承认汪精卫伪政府以迎合日本。国民政府宣布与德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关于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书中也有几篇不错的论文,如山东赵振玖同志的《德国获取山东矿权和山东人民的收回矿权运动(1898—191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宓汝成研究员的《中德关系中的铁路问题》。宓汝成对中德铁路问题有专著出版,而中国人对德国的铁路也是一直很感兴趣的。德国人的铁路起步并不早,开始一直落后于发明蒸汽机的英国人,到1835年才有第一条铁路,然而德国的铁路发展得很快,迅速成为世界上拥有最领先技术的国家之一。柏林自由大学东方学系柯兰君(Bettina Gransow)也提供了她的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德经济技术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关于德国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的影响,书中的最后部分收录了几篇论文。其中有北大德语教授孙凤城的文章《德国文学在中国》。孙教授是清华大学杨业治教授的儿媳,杨教授在西南联大时就是资深的德语教员,我在清华上大学时,我的大一和大二的德文就是杨教授教的。孙凤城的文章主要谈歌德的诗歌和著作《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五四”运动前对中国产生的深刻影响,她曾带着这篇文章访问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的论文《德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如何看待德国人在中国的作用(1890—1945)》,从人文的角度做出了相关分析。

《论集》中有一篇文章是中央编译局殷叙彝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我们这些中国作者中,除了贺麟先生、刘心务先生以外,德语水平当数殷叙彝教授高了。他从中学时代开始学德语,大学时代在北大历史系时德语已经很好。改革开放后他曾访问德国,访德归来后他对我说,当他走在德国的大街上时感到如入梦境一般,一下子就把现实与他幼年时所学的德语联系起来,便什么都听懂了。

最后,关于这部《论集》中我想要介绍的是贺麟教授为我们提供的

论文《尼采哲学对中国的影响》。贺麟先生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在有人把他誉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青年时代为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意从美国转学至德国,是国内公认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权威,是真正的大家。

贺麟先生 1955 年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现属社科院)工作,但他一直与北大关系密切,也是我所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在我们开始与柏林自由大学合作后,贺先生也是积极给我们提供稿件的作者之一。他给了我这篇内容丰富的不可比拟的用德语直接撰写的长文。当时贺先生为保证译文的质量,特请清华大学杨业治教授用德文版和英文版的《尼采全集》对照译稿加以审定。此稿的前一部分由我亲自翻译。我为了理解尼采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为何从好友到最后毅然决裂,以及希腊悲剧尼卜龙根的故事,曾去请教过杨业治先生,受益不少。

贺麟先生的这篇关于尼采思想对中国“五四”前后知识界影响的文章确实精彩,从他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王国维是把尼采思想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陈独秀、蔡元培、鲁迅都曾在尼采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发挥过影响作用。“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也以崇拜尼采而知名。相信读者会从中找到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文化及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国内中德关系研究中受到很高的关注。而以往国内对尼采对中国的影响介绍很少,贺麟先生的这篇万言力作应该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张振鹄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在邵循正先生指导下于 1965 年就出版了《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当时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师生必读的参考书。蒙他在为即将召开的“北洋海军建军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撰写论文的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序》,为本书增色不少。深为感谢!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同志,是她破格为我

出版这本签约后拖延了二十年才交付全部文稿的作品。衷心地希望这部《中德关系史研究论集》能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帮助,也可了却当年这一批作者为促进中德两国关系不断健康向前发展的心愿。

张寄谦

2008年9月于北大中关村